

雕魂：石上生万物

151年落成的《从事武梁碑》，如是称赞武梁子孙的孝道：“孝子仲章、季章、季立，孝孙子侨，躬修子道。竭家所有，选择名石，南山之阳，攬取妙好，色无斑黄。”这短短的文字，也为后世考古学家探索武梁祠的采石工程提供了草蛇灰线般的信息。孝子贤孙为逝者武梁耗费大量家财，目标直指南山之阳的优质石灰岩。这不是盲目的挖掘，汉代工匠对石材有着严苛的审美：颜色纯净无杂斑，质地均匀坚韧。

嘉祥，这片鲁西南的土地，是汉代石作手工业的重镇。它的石材不仅滋养了本地的武氏墓群，更远行他乡。考古学家发现，50公里外梁山薛垓墓地的石模板材，可溯源至嘉祥的石灰岩矿脉。在构造墓地时，石板是在采石场开采时就确定了规格，开采后编号直接运到墓地，中间没有再经专门的石材加工作坊。不刻画像的，运到后就下墓扩建石椁；刻画像的，则在墓地现场或附近刻完后再下扩建石椁。

开采是画像石产业链轰鸣的第一声。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杨爱国介绍，就目前已经发现的采石场与墓室建筑的距离看，除了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部分塞石是就地开采的外，大部分采石场与石材使用地之间有一定距离，需要通过陆路或水路运输，才能把石料运到使用现场或加工作坊。巨石出山，陆路或水路的漫长迁徙随之开始。圆木在重压下呻吟，绳索深深勒进石头的肌肤，舟楫在河水中沉稳前行，将沉睡的山之骨送往工匠云集的作坊或墓地现场。

粗粝的石坯抵达终点，良匠便开始施展“魔法”。《从事武梁碑》以寥寥数语勾勒其功绩：“雕文刻画，罗列成行，委蛇有章。”这背后是繁复到极致的工艺。

先是“起稿”。想象这样的场景：工匠手持墨笔，在打磨平整的石面上从容勾勒。杨爱国指出，许多画像石上残留的墨线痕迹，揭示了这道关键工序的存在。所谓“罗列成行，委蛇有章”，正是精心布局的写照，人物故事、祥瑞神兽，如何在有限石面和谐共生，皆在笔线纵横中流淌。

接着，刻刀登场。武氏祠画像石采用典型的“凸面线刻”：磨平石面，勾勒物像轮廓，然后凿去轮廓外的部分，使画面微微浮起，最后在凸起的阳文上，以阴线精雕细琢。刀锋游走，从粗犷的轮廓到精妙的细部——西王母发髻的每一缕丝纹，荆轲刺秦时怒发冲冠的瞬间，车马行列中骏马腾跃的肌肉张力，皆在这“硬碰硬”的较量中诞生。线条或刚劲如铁，或婉转流畅，在“笨拙”的石头上，舞动出无比灵动的生命韵律。

当然，并非所有构件都在固定工坊完成。史料与题记显示，许多量身定制的祠堂，如武氏阙铭、东阿邓他君祠堂等，是在墓地现场加工雕刻并就地安装的。



《地雷战》：地雷一响，旗开得胜

抗战文艺

□ 本报记者 师文静

1962年，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经典军事教学片《地雷战》让烟台海阳人民的英雄事迹闻名全国。凝聚智慧与胆识的地雷战，呈现了胶东人民奋起抗战的英雄精神。

1942年，日本侵略者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周围设置大量据点，对根据地展开蚕食和扫荡。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与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。

《地雷战》以烟台海阳的地雷战盛况为原型拍摄。影片详细展现了地雷战的技战术，塑造了鲜活的人物，讲述了精彩的抗日故事。

影片一开始，因日军驻扎到附近的黄村，赵家庄的村民迅速转移到山中。民兵队长赵虎发动周围几个村的村民，用地雷对日军反击。赵虎带回来的地雷战打法是：“鬼子少了咱就干，鬼子多了咱就转。躲在暗地打冷枪，埋好地雷

在永恒的石头上，镌刻下中华文明不断前行的轨迹——

“制造”武梁祠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本报实习生 董诗妮

1800多年前，嘉祥的武氏家族陆续雇佣良匠卫改、孟孚、李弟卯、孙宗等人，制造了武氏阙、石狮子和武梁祠等史诗级的艺术宝库。

为何说制造武梁祠？与纸笔柔软碰触不同，雕刻画像石是一场硬碰硬的艺术创作，要求工匠既要有胸有成竹的果敢，又要有胸无成竹的随遇而安。他们建立起文化脉络的枢纽，也是当时完整画像石产业链上最不可少的一环。



筑祠：拼合天堂的力学

当最后一道刻痕完成，真正的挑战才拉开序幕——将数以吨计的预制石材，组装成悬山顶、双开间甚至带小龕的复杂祠堂。没有起重机，没有现代机械，全凭人力、智慧与土方工程。

石阙相对简单，如营县东莞孙嘉闾，只需将石材依次叠加。可遇到武氏前石室、左右石室这类结构精巧的悬山顶祠堂，或朱鲋石室般高大的建筑，安装巨大的过梁石和沉重的盖顶石，堪称力学的冒险。画像石虽虽绕开了立柱架梁的麻烦，但每一块石头的拼合都需精准无误，“稍不小心就会塌下去”。

堆土成坡，是汉代工匠的智慧。他们垒筑土山，利用斜面将巨石运送至预定高度，如同建造金字塔。石材就位，层层组装，祠堂或墓室的骨架在泥土的怀抱中逐渐成形。当最后一块顶石落下，泥土被小心清除，一座由石头构筑的永恒殿堂——死者的“天堂”模型——便巍然矗立在生者面前。武梁碑所载“前设坛墀，后建祠堂”，正是这道最终工序的礼成宣告。笨重的石头，经由人力，被赋予了神圣的秩序和空间。

建一座画像石祠堂要花多少时间，在个别画像石祠堂题记中有记录。多他君祠堂从采石到建成用了两年多：“堂虽小，经日甚久，取石南山，更逾二年，这（迨）今成矣”，而且是“师操义，山阳蝦丘荣保，画师高平代盛、邵强生等十余人”共同完成的。微山两城永和六年（141年）桓春祠堂用了一年多，许牟史安国祠堂用了数月。

在恢宏的武梁祠建筑群前，个体的人显得如此渺小。然而，历史的长河中，竟有幸留下了几缕微光——那些在题记中镌刻下自己名字的工匠。

最耀眼的莫过于良匠卫改，他是武梁祠艺术成就的缔造者之一。这个庞大的群体留名者凤毛麟角，如肥城莱山镇村为张文思父留名祠的土工王次、许牟史安国祠堂题记中的高

平名工王叔，王坚。学者邢义田指出，这些名匠并非机械的执行者，他们“有自己的职业传统”，甚至可能“自主创作，带动流行”。

不论是固守家园，还是远走他乡，汉代石刻工匠留下姓名的是极少数，石刻产业大军中的绝大多数默默无闻地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，不为人知。

石工技艺的传承应是父子、师徒相传的。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赖非指出，石刻工匠“父子师徒代代相授，门户之间，各有自己的传统”。“元嘉元年八月廿四日，立廓毕成，以送贵客……朱雀对游西仙人，中行白虎后凤皇。中直柱，双结龙，主守中雷辟邪殃……堂石央外，君出游，车马道从骑吏留，都督在前后贱曹。上有虎龙街利来，百鸟共持至钱财……学者高迁宜印绶，治生日进钱万倍。长就幽冥则决绝，闭阍之后不复发。”这段文字出土于兰陵县城前村的碑刻中，学者普遍认为这是画像石匠人师徒相传的口诀。

武氏阙题记冰冷地记录着他们的劳动价值：“造此阙，直钱十五万；孙宗作师（狮）子直钱四万。”十五万钱，是武家孝心的货币化表达，也是工匠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。丧家寄托哀思，工匠获得生计，双方共同维系并推动着汉代石作手工业的车轮。

俱往矣，“碑大小”的深意在时间的河床里静静流淌。

当我们在武梁祠前惊叹于壁面上的伏羲女娲、荆轲刺秦、车马浩荡，感受那份“气魄深沉雄大”时，不应忘记，是无数个无名的“卫改”“王次”“孙宗”，用布满老茧的双手，在粗糙冰冷的石头上，一凿一铲，雕刻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，也雕刻出自己卑微却坚韧的存在证明。笨拙的石头因灵动的线条而不朽，而赋予石头灵魂的人，却常常隐没于宏大的“碑”后，成为历史幕布上模糊而伟岸的剪影。



余音：石不能言最可人

时光流转，黄河的泥沙最终掩埋了武氏祠的荣光。直到清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金石学家黄易如同一个跨越千年的知音，让四十余块画像石重见天日。然而，重见天日的石头已次序大乱，“前石室”“后石室”“左石室”的标签，掩盖了它们原本在建筑中的确切位置。

20世纪40年代，美国学者费慰梅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。如同破解立体拼图，她依据拓片比例、雕刻风格、题材布局，特别是与已知结构的孝堂山石祠比对，开始了艰难的纸上复原。她敏锐地捕捉到那些被普通拓工忽略的“平素的边缘，几何花纹的带条”，这些细节是重建建筑逻辑的关键钥匙。

经过无数次尝试，武梁祠、前祠、左祠的墙体配置图在她笔下渐渐清晰，揭示了画像在建筑空间中的叙事逻辑——西王母、东王公雄踞山尖，儒家圣贤位于高位，车马出行环绕于下，中心是象征祠主永恒的楼阁宴饮。费慰梅的复原工作揭示，图像的意义需置于建筑整体结构与丧葬仪典中才能被完整理解。石头的位置，决定了故事的语境。

杨爱国指出，有些问题需要继续研究。比如，目前所见史料，虽然可以看出工匠在引领风尚方面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，但是否由他们主导了汉代画像石的流行，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。再如，关于画像石作坊的有关问题，作坊是设在居址附近以便工匠的生活，还是设在公共墓地附近以便丧家取用，我们一无所知，只是根据画像石发现的情况推测当时有与之相关的作坊，至于作坊的内部管理更是无从谈起。

今天，当人们步入嘉祥的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，凝视那些曾高踞山尖的西王母、东王公，端详那些描绘着古代帝王、孝子烈女、刺客忠臣故事的画面，触摸那些历经千年依然生动的线条，仿佛能听到凿凿与石头的对话，看到工匠专注的眼神，感受到丧家虔诚的哀思。

石不能言最可人。最笨拙的石头，也能承载最灵动的线条；最宏大的史诗，往往由最渺小的人物书写。这，就是“制造”武梁祠的奥义——在永恒的石头上，镌刻下中华文明不断前行的轨迹。



千年“三孔”何以风华依旧

□ 本报记者 孟一
本报通讯员 张帅 徐宽

晨曦穿透古柏，洒在孔庙奎文阁的雕甍上。有着37年工龄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孔令伟仰头审视梁枋斗拱，和身后五代匠人组成的“三孔”古建队一道为圣殿“把脉问诊”。这看似平常的晨间巡查，正是曲阜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体系的鲜活注脚。

“治未病”：岁修织就防护网

“老张，奎文阁（外廊）地砖裂了，带上家伙事，闭园后抢修！”日前，孔令伟巡查时敏锐捕捉到一块看似不起眼的地砖裂缝。酷暑高温逼近40度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即召集人马进入“战备状态”。

待游客散尽，拆旧砖、铺新埧、精细处理面层、最后均匀涂抹两遍生桐油“钻生”……一块小小的地砖，修复流程一丝不苟，耗去整整三个小时，工作结束时已是星河低垂。

“雨季到了，外廊地砖渗水，会泡坏建筑基底，那时就得动‘大手术’了！”抹去额头的汗水，孔令伟长舒一口气。在他眼中，古建修缮如同医道，“治小病”、“防未病”，远比“医沉痾”更科学、更经济。

孔令伟所在的“三孔”古建队历经七十多年实践，摸索出了一套以固定班底为支撑的规范性岁修机制，这也是文物“最小干预”保护原则在曲阜的生动体现。

岁修，即每年按计划进行的周期性维护保养，核心在于预防——从小处着手，消除隐患，延长寿命，避免陷入“修了坏、坏了修”的怪圈。春季上房拔草“倒垄”，防草木撑裂瓦墙；秋季及时清扫落叶，阻积水侵蚀构件……这些看似细微的劳作，构筑起文物长治久安的基石。

以赛育匠：淬火砺出真功夫

7月6日，四川泸州，2025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——第二届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收官。“三孔”古建队5人出征，4人载誉而归。其中，木作工匠江新乾再次力压群雄，问鼎赛场。

“大赛是磨刀石，逼着我们精益求精，练就真本事。”江新乾坦言，比个人技艺精进更欣慰的，是大赛点燃了社会对古建修缮技艺的热情。

曲阜，堪称古建技能大赛的先行者。早在2015年，曲阜就创新举办了首届古建职业技能大赛，初衷明确：以赛代练、以赛聚才、以赛扬名。

大赛的持续发酵，今年为这支传承五代、坚守七十余载的200人专业团队带来了3名“95后”新锐。22岁的杨子豪深受国潮兴起和文保报道的影响：“辛苦是真辛苦，但能从时间手里抢救文物，在精雕细琢中磨砺匠心，既非凡又帅气！”

入队后，杨子豪拜师江新乾，从零苦练木作基本功。江新乾的教学坚守手把手，传帮带的老传统——刮料找平、锯割切割、凿孔修理，一步不落。

“制作工艺本身，就是文物承载的历史密码。”江新乾强调，“三孔”古建队恪守祖传技艺，严格依据《孔府档案》等史料修复建筑，“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，培养出技艺精湛、深谙文化的修复师，把守护的担子稳稳传下去！”

古艺新生：科研注入创新力

2020年7月，一场科研攻坚启动。曲阜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联合故宫博物院、东南大学、天津大学等机构，承担了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研发课题——《明清官式建筑营造技艺科学认知与本体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》。其中，曲阜与东南大学担纲“明清官式建筑传统材料保护与材料改性研究”子课题，主攻石灰替代难题。

潜心试验，成果斐然。团队首创“隔、阻、修”材料保护新策略，融合有机-无机复合、聚合物接枝与分子裁剪、纳米改性等尖端技术，成功研发出砖石灰和油画糊系列保护新材料。2021年，这些新材料在曲阜孔庙神庖院门屋面及院墙得到实际应用。

示范工程结束后，严格的监测（拍照、石灰试块强度测试、环境温湿度记录）随之展开，形成了详实的设计、施工方案及总结报告。2023年12月，整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功结项。权威专家验收意见明确：曲阜和故宫的示范应用效果显著，新材料在自然环境下一年无脱落、无变色粉化，性能指标完全达标。

科研创新，已成为“曲阜范式”的强劲引擎。为在恪守老技艺、老传统的前提下持续焕新保护路径，曲阜大力招才引智：2家国家级、1家省级文物科研基地，1家国家级文物建筑人才培养基地，8所高校教学实践基地相继扎根于此；李永革、王明尧、孔祥民（齐鲁大工匠）等大师工作室纷纷挂牌，搭建起高水平研究交流与人才培养平台。同时，积极提炼保护实践中的科技亮点，申报成立山东省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区域中心……“传统技艺+科研转化的可持续保护之路正越走越宽。

千年文脉，薪火相传。从岁修织就的防护网络，到以赛育匠淬炼的匠心队伍，再到古艺新生驱动的科研创新，当孔庙的晨钟再次响起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能工巧匠在聚坊间的精雕细琢，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根脉的虔诚守护。

